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Marxism and the City 美艾拉·卡茨纳尔逊著 王爱松译



城市研究系列
Urban Studies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 (美) 艾拉·卡茨纳尔逊著;
王爱松译.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7.4
(城市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499 - 6345 - 4

I. ①马… II. ①艾…②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
城市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5330 号

- 书 名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著 者 [美] 艾拉·卡茨纳尔逊
译 者 王爱松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电话 025-57572508)
厂 址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 211523)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99 - 6345 - 4
定 价 42.00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公 众 号 苏教服务(微信号:jsfhjyfw)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02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出版说明

城市研究领域很深广,涉及多学科内容。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规划、可持续发展等主题,都与城市有关。这些主题大致涵盖了实体的物质空间和抽象的文化空间,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代生活有关的问题大多是城市问题。

“城市研究系列”即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在理论上的一种回应。“系列”以经典性与前沿性为导向,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在内容方面重点关注与城市主题有关的经典性著作、各学术流派的代表作、当代前沿问题研究、城市研究新理论、城市文化现象与发展方向的探讨等。这些内容不仅追溯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诸多富有影响力的节点,也契合了当前社会的热点和趋势。

“城市研究系列”既重视国外先进的城市研究著作的引入,也重视国内城市研究领域中的优秀的原创著作的出版。我国的城市研究起步较晚,引入国外先进的学术理论,其目的是丰富我们认识城市的路径,建立更加科学的观照体系,从而形成并完善我们本土的城市理论系统建构。

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击者、参与者、解释者、引领者,我们有

责任告诉世界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这一巨大的城市化转型中所发生的一切。而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值得我们去探究,去呈现,去引领。

我们期待“城市研究系列”这一高水准的中外城市理论研究出版平台所带来的新角度和新方法,所开启的新视野,所探讨的新问题,能为我国新型的城市化进程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持。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从今往后，我将向你描述城市，”可汗说，“而你在你的旅途中，看看它们是否存在。”

但是马可·波罗到访过的城市总是不同于皇帝想出来的城市。

“然而我在我的头脑中建造出了一座样板城市，从中可以演绎出所有可能的城市，”可汗说，“它包含的每一事物都符合常规。因为现存的城市不同程度地偏离常规，所以我所需要的只是预见常规之外的例外，计算出最不可能的组合。”

“我也曾想过一个样板城市，从中演绎出所有其他城市，”马可回答说，“它是一座只由种种例外、排除、不一致、矛盾所构成的城市。如果这样一座城市是最不可能的，那么通过减少不合常规的元素，我们就可以提高这座城市真正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只要我从我的样板中减去一些例外，无论我向哪个方向走去，我都会到达一座总是作为一种例外而存在的城市。不过，我不能强迫我的运算超出一定的限度，否则我会获得种种过于可能而不能成为真实的城市。”

伟大的可汗拥有一本地图集，其中收集了所有城市的地图：那些城墙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的城市，那些城墙夷为废墟而被漫漫黄沙吞没的城市，那些现在只有野兔肆虐而有朝一日终将拔地而起的城市……

地图集拥有这样的品质：它显露出尚没有形式或名字的城市形态。有一座城市采取了阿姆斯特丹的形式，朝向北方的半圆形，拥有同心圆状的四通八达的运河——王子的，皇帝的，贵族的；有一座城市采取了约克的形式，坐落于高高的旷野之中，城墙环绕，高塔林立；有一座城市采取了新阿姆斯特丹又名纽约的形式，在两河之间的椭圆形岛屿上，玻璃和钢铁的高楼挤挤挨挨密密麻麻，街道就像深深的运河，除百老汇之外，所有街道都整齐笔直。

众多形式的目录永无穷尽：在每一种形式找到自己的城市之前，新的城市将会连绵不断地产生。当城市耗尽了它们的变化并走向瓦解之

时,城市的末日就开始了。在地图集的最后几页,网络如水一样地倾泄开来,无始无终,城市的形状,是洛杉矶的形状,是京都-大阪的形状,是全无形状(without shape)。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69, 137~139.

前 言

由于在东欧失败，在西欧受到质疑，并且缺乏识见的或通俗的支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统治指南已经衰落。为什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虽然即使在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里，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和批评资源，但为什么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作为社会和实践理论，在其整个发展的时间跨度中，马克思主义对城市谈论得相对较少。此外，在 20 世纪末，城市本身已经逐渐蔓延开来、模糊不清（像伟大的可汗地图集最后几页上的城市），甚至也许走到了根本没有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范畴的一步。

我写作《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最重要的原因，集中在两个基于直觉的想法。第一个想法是，尽管作为一个认知和统治方式的整体有其所有深刻的、根基不牢的瑕疵，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理解和质疑现代性关键方面的一个有用工具，此外，在自由公民权和自由市场在概念竞争上获得决定性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维度（虽然是以一种比马克思主义者一度所希望的远为谦逊的方式）现在可能还是找到了一种新的意义——作为思想和政治摩擦的一种资源。第二个想法是，通过迫使马克

思主义认真地介入城市-空间议题(尤其是在处于所有有用的社会理论之核心的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方面),作为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弱点可以得到弥补。简言之,我认为这一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宏大的、深思熟虑的论文,能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分析做出更有力量的(即使是更有限的和谦逊的)贡献。

在一定程度上,我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城市这一明显特殊的主题是出于个人和学术的原因。当开始思考本书时,我已经完成了一卷论述美国城市和工人阶级形成的书。我不满意《城市战壕:都市政治与美国阶级的模式化过程》(*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潜在的、未加考察但不是很显著的亲马克思主义品质。那本书间接地对有关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学术著作做出了贡献,并且对那时流行的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致力于城市的著作提出了具有同情理解的批评。然而,《城市战壕》的中心推动力,是关注美国的阶级、政治和集体行动问题——这些问题通常被浓缩到了“美国例外论”的标签之下,这样一个焦点让我愉快地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城市研究的某些关键问题。

事实证明,受邀写作《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在这一时刻为我提供了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机会——此时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正开始第一次在其思想和学术史中将城市认真地当作社会理论的一个构成要素加以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内部聚焦城市是由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20世纪60年代的开拓性著作所发动的。他从对诸如此类城市领域的基础性批判开始,进而走向了对城市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诸如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克里斯·皮克万斯(Chris Pickvance)、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约翰·洛杰金(John Lojkin)、莎伦·佐金(Sharon Zukin)、克里斯蒂安·托帕洛夫(Christian Topalov)等天才的思想大师以及许多其他地理学家、社会学

家、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手中，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了城市领域改革的主要源泉。图书馆杂志收藏的相对新来者——《空间与社会》(*Space and Society*)、《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对跖地》(*Antipode*)——在了解城市研究的范式转变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至少对年轻学者来说是如此)。今天，在经历了一个强烈的创造期之后，这种学术努力的活力已减退，或至少已变得更为散漫。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是否已到一一个结束或停滞期还不完全清楚，但总之，这是一个做出评判的好时间。

然而，《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主要不是一部评述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主题-素材呈现出了其他承诺。城市总是其文明的浓缩。假如其密度变了，那么它也会暴露出某些东西。通过聚焦作为空间中的点、具有确定形式的地方、人类活动之场所，从这一视角有可能阐明历史的关键层面、可替代的社会理论适用性。我认为，通过聚焦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有助于对现代西方城市发展做出解释的方式；聚焦马克思主义如何可能将城市和城市空间整合到它自己的分析框架之中，可能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力做出评价。我试图表明：通过纳入一个城市-空间维度，马克思的主要分析工程是如何从中得到加强的，而且，反过来，城市研究的某些主题和我们对城市的理解，是如何经由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而得到说明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相遇有助于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中心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特征是由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部充满活力的学术气候塑造出来的，这里的同仁们提醒我学术工作就是私人行为和集体行为间的平衡。我要特别感谢詹奈特·阿布-卢古德(Janet Abu-Lughod)、杰弗里·戈德法布(Jeffrey Goldfarb)、戴维·古登(David Gordon)、诺曼·费恩斯坦(Norman Fainstein, 现在在纽约城市大学)、阿旺·谢克(Anwar Shaikh)、查尔斯·蒂莉(Charles Tilly)，他们阅读了原稿的一个早期版本并提出了口头批评。我要感谢安德鲁·阿拉托

(Andrew Arato)、杰罗米·布鲁纳(Jerome Bruner)、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索尼娅·克鲁克斯(Sonia Kruks, 现在欧柏林学院)、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罗斯·汤姆森(Ross Thomson)、路易斯·蒂莉(Louise Tilly)、阿里斯蒂德斯·佐尔伯格(Aristide Zolberg), 他们在社会变化研究中心研讨班和研究生部常规讲习会对各章的讨论中也提出了建议。

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之外, 史蒂文·卢克(Steven Lukes)富有价值的编辑评论促使我对原稿做出了完善。沙穆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在罗素哲人基金会学术休假访问期间, 慷慨地抽空对手稿各章进行了评论。事实证明, 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社会结构与社会变化 A. E. 黑文斯(A. E. Havens)研究中心长达一周的逗留也尤有帮助, 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奥林·赖特(Eric Olin Wright), 还有戴维·沃德(David Ward)、伊凡·塞勒尼(Ivan Szelenyi)、罗杰斯·霍林斯沃思(Rogers Hollingsworth)、朱丽娅·亚当斯(Julia Adams)以及中心的其他成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写作这本书时的一个特殊关键时刻去检验我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导引”丛书的一个编者之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完稿之前仙逝。当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剑桥大学做学生时, 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并听过他的演讲。自那以后, 像无数其他人一样, 我对他怀有莫大的敬意, 并受到他杰出著作的引导。我十分高兴有机会在刚开始时与他讨论我写作本书的计划, 并为能跻身他共同主编的丛书之中而深感荣幸。

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部 艾拉·卡茨纳尔逊

|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1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主题	39
第三章 走向重新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哈维与卡斯特尔	83
第四章 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与阶级形成: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组织的旅程	129
第五章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城市的地方	144
第六章 工人阶级图绘城市	185
第七章 重绘城市	232
主要参考书目	278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但泽(格但斯克)是建在海上或靠海的运河城市。卢塞恩、日内瓦、苏黎世坐落在湖的尽头，一条河从城中穿过，直抵湖中。在何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城市是可堪比较的分析对象？这些三联体(这词是我从吕西安·费夫尔对城市的讨论中借来的^①)中的每一组以什么样的方式构成了城市的意义丛？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它们性格和质质的同与异？

只有当我们严格地将我们自己对城市的分类和分析限制在城市的自然场所方面时，可能的回答才是不言自明的。在1898年写到城市时，维达尔·德·拉·布朗肖(Vidal de la Blache)提出，城市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是双重的：“自然准备了场地，而人以让自然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的方式对自然进行组织。”费夫尔在引用这一公式的同时，很快就发现，在

① Lucien Febvre,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32, 338~341. 费夫尔开始讨论城市时，激赏地理学家各种各样的类型学和分类，但随后很快地对他们的深度和意义提出了质疑：“并不是每一种比较在本质上都是有价值的”，他说，“将法国国王归为胖或瘦、高或矮，对他们的统治或性格的知识不会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贡献”(339)。

最小的程度上我们也需要将城镇的起源与城镇的进程区分开来,以弄清城镇的发展。因此,必须考虑城市的物理场所是对城市建立的一个贡献因素,但是,一旦它们形成,城镇就开始发展出分道扬镳的历史;对城镇来说,“在城市有机体的发展中,所讨论的物理特殊性必定使地方屈从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自然因素和极为重要的发展或……扩大的因素”^①。

不对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自然因素”进行持续和系统的思考,城市必定依然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研究对象。假如我们像刘易斯·芒福德那样认为城市是“一个共同体的权力和文化的最大凝聚点”^②,那么,城市研究就不亚于是对人类文明及其宏观进程的一种特殊研究(即使限定所思考的实证范围的时间和地点,情况也是如此。就像我这本书一样,关注的主要是16世纪以后西欧和北美的城市^③)。从这一观点看,“城市

① Lucien Febvre,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32, 340~341. 也可参见费夫尔第348页对历史和政治诸因素的讨论。这种讨论中缺乏对作为一种技艺的城市设计的关注,以及对城市设计和宏观的社会进程间联系的关注。很显然,如果不聚焦宗教的作用便不能弄清中世纪的城镇,不考虑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业,就不能弄清19世纪的城镇。

② Lewis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8, 3. 无论城市是文明的希望还是文明的否定,都是各时代流行一时的辩论主题。这里的相互竞争的城市意象,都基于一个共同的想法:城市,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人类文明特殊种类的缩影。

③ 这种限定不是没有代价的。由于我略过了东欧、中欧和苏联的城市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重蹈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者论述城市著作的覆辙,没能认真地、比较地处理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模式。我出于关注重点和专门知识的原因做出的这种决定,使得精确地参照其他原因准确地地区分资本主义对封建社会之后的城市化造成的差异更为困难。正像默雷和塞勒尼所指出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的主要缺陷,是缺乏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城市理论。只要新城市社会学不给我们提供一种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化本质的全面理论解释,就总是可以怀疑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权利声称它们在西方城市中所发现的悖论可以实际上与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联系在一起。”Pearse Murray and Ivan Szelenyi, ‘The City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8(Mar. 1984), 93.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它不像这一雄文所提出的那样是一种根本性的批评,因为它接受生产方式是解释历史的基本工具,是比较分析的构成单元。一旦做出这种关键判断(当然,它本身也是欢迎质疑的),如何开展一个研究项目,使用何种比较策略的问题,就是虽然十分重要却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联姻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与苏联和东欧经验的比较不是密切相关的;在另一些人看来,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伊凡·塞勒尼既持之(接下页)

是普遍的社会力量的一种证明；但它的同一性来自对社会力量的一种特殊调适”^①。

鉴于城市研究的范围广阔无边，有一大批有关城市的定义和类型学、一系列有关城市研究对象的分类，一点也不足为奇。城市是大范围内的人口集结、凝聚于空间的特殊功能、司法单元、有界限的飞地，或所有这些东西甚至更多的东西吗？即使是在芒福德这样杰出的城市研究者手里，其城市的工作定义也不过是一个有用的路标，他对城市的定义讨论布满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分析、暗示和隐喻性的说明：城市是“大地的产物”，是“时间的产物”，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像一个洞穴，像一串鲑鱼，像一个蚁冢”，“一件有意识的艺术品”，“人的社会需要”的表达。^②

然而，我再清楚不过的是，芒福德对“城市社会学概念”的概括性讨论，提供了对这一主题的有用理解，甚至在他论证和要求城市研究是一个像对人类文明研究一样广阔的研究领域时，也是如此：

一个城市存在的基本物理方式，是固定的地点，持久的居所，用于集结、交换和储存的永久设备；其基本的社会方式是劳动的社会分工，这种劳动分工不仅服务于经济生活，而且服务于文化进程。那么，城市按其全面的意义来讲，是一种地理的错综复杂组合，一种经济组织，一种制度进程，一个社会行动剧场，一种集体性审美象

(接上页)以恒又富有影响地拓宽了城市调查的范围，纳入了社会主义的经验。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所发表的三篇论文，对确立他自己后来的著作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议程尤为重要：Ivan Szelenyi, ‘Structural Changes and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Urban and Reg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5(Mar. 1981); Ivan Szelenyi, ‘Urban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Management in Eastern Europe’, *Theory and Society*, 10 (Mar. 1981). and Murray and Szelenyi, ‘The City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① Eric Lampard, ‘The History of Cities in the Economically Advanced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Jan. 1955), 84. 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对这一关系的构想。

②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3~6.

征。一方面,它是普通的家庭和经济活动的一个物理框架;另一方面,它是更有意义的行动和人类文化更崇高推动力的一个有意识的戏剧性背景。^①

面对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去中心化的主题,大部分城市研究将它划分为易处理的各部分,研究城市生活的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其建筑、经济、政治、集体行动、生活风格、符号象征。实质上,对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和城市经济学的每一学术述评,都会哀叹这样的混沌无序和四分五裂。是的,它们应当哀叹。因为,正像我们马上会看到的,这种碎片化不仅根源于这一主题的广大无边,而且根源于大多数20世纪城市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基于一种强调现代工业社会真正的、令人困惑的复杂性之上的城市和社会模式。甚至自19世纪中叶西方城市大爆炸之后,试图不去片面地理解城市诸因素的社会理论家,也在按照一种分化地看待现代性的方法范围内展开研究。假如我们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研究的潜在贡献,我相信需要同时理解和批判我们要开始讨论的社会理论中这一传统。^②

然而,在转向这种思考之前,还要优先提出一个问题。形形色色的城市主题、理论、分类和方法,是缺乏确定性的象征,不仅涉及社会科学

①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480.

② 学科意义上的城市研究的这种碎片化和与日俱增的子领域的专业化有增无减。在1985年的一篇述评文章中,地理学家J. W. R. 怀特黑德写道:“在说英语的世界里,城市地理学正进一步地显示出分化为一系列专业的迹象:零售业,政府部门,居所的流动,公共服务的提供,形态学。”一年以后,他继续发现了甚至“越来越专业化的研究,同时伴随着殊为可贵的另辟蹊径、将个人的小分支研究联系起来的尝试”。J. W. R. Whitehand, ‘Urban Geography: The City as a Pla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9 (Mar. 1985), 85; Whitehand, ‘Urban Geography: Within the Cit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0 (Mar. 1986), 103. 同样,谢夫特注意到了政治科学内城市概念的多元性,城市被五花八门的地理理解为一个共同体、一种业务、一个竞争的市场、政治动乱的所在地。Martin Shefter, ‘Images of the Cit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Robert M. Hollister (ed.), *Cities of the Mind*. New York: Plenum, 1984.

是否拥有分析城市的必要工具,而且涉及既作为经验建构也作为理论建构的城市是否是一个可供研究的连贯一致的实体。^①

菲利浦·艾布拉姆斯有力地提出,城市分析之所以经常沦为一种被误置的具体性的牺牲品,正是因为“城市不是一个社会实体”;因此,各种城市研究领域的实证研究“被证明是对城镇的实际总结的坟墓”,我们不应当大惊小怪。他坚持说,中心的问题是要像这样一样聚焦城市实体:

城镇是一种社会形式,在其中,社会关系更大系统的基本属性得到高度的凝聚和增强——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住房的规模、密度和多样性,城镇的形式特征,似乎本质上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秩序的构成属性。^②

因此,有一种趋势:集中于城市形式,而不是集中于诸如赋予城市以形状和意义的国家建设或资本主义发展等关键社会进程的实质。^③

-
- ①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碎片化反映出各种学科与日俱增的专业化和技术复杂性,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次要特征。假如有人阅读地理学子学科的各种报告,比如刊登于《人文地理学进展》上的报告,就会马上意识到缺乏连贯性——不仅这些子学科(工业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等)的纯粹数字缺乏连贯性,而且对重要的东西在特定的子学科内有多重要的强调也缺乏连贯性,年与年之间、作者与作者之间多有不同。城市地理学尤其如此。
- ② Philip Abrams, 'Towns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Theories and Problems', in Philip Abrams and E. A. Wrigley (eds.), *Towns in Societies: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9, 10. 发展了艾布拉姆斯观点的一篇学科述评是: R. E. Pahl, 'Concepts in Context: Pursuing the "Urban" of Urban Sociology', in Derek Fraser and Anthony Sutcliffe (eds.),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3.
- ③ 我们也许希望首先留意艾布拉姆斯立场的两种变化。彼得·桑德斯以《论城市的独特性》一章给其著作《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Hutchinson, 1981)作结。他发现,城市社会学一直在“为一种社会学现象”寻找“可能处于城市的物理实体之中的根源。这是一种体制化的子学科寻找主题的历史”。他得出结论说,城市构成了“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一个有效的分析对象……但是它对于社会学的重要性仅限于其作为一个社会的微观宇宙的有用性……或道德密度对社会关(接下页)